

中国教育六十年 纪事与启思

下册


(1949—2009)

◎ 储朝晖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储朝晖 著

中国教育六十年 纪事与启思

下册



(1949—2009)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Contents 目 录

下 册

第四章 价值：个人与社会	/457
第一节 教育价值问题的界定	/458
第二节 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	/461
第三节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467
第四节 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	/477
第五节 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484
第六节 对“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批判	/490
第七节 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499
第八节 教育为人民服务	/509
第九节 以人为本——教育价值的回归	/515
第五章 体制：公办与民办	/520
第一节 国家主义教育理念事实上的确立	/521
第二节 国家包揽教育	/524
第三节 难以平衡的“两条腿走路”	/564
第四节 艰难曲折的教育体制改革	/576
第五节 民办学校发展的坎坷	/596

第六章 管理：行政化与专业性	/606
第一节 政治工作者管理学校	/607
第二节 中国式的校长负责模式	/621
第三节 教育家办学	/636
第四节 知识获取导向的评价	/641
第五节 呼唤现代学校制度	/676
第七章 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679
第一节 教育决策的程序与类型	/680
第二节 教育决策个人权威化	/682
第三节 民主决策的有限存在	/701
第四节 权势下缺乏理性的教育学术	/708
第五节 思想的贫乏	/720
第八章 教师：职业与精神	/725
第一节 教师职业的通常定位	/726
第二节 争取、团结、改造	/728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之一	/772
第四节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785
第五节 待遇与地位变迁	/796
第六节 专业化走向何方	/831
后记	/871

第四章

价值：个人与社会

教育价值问题是当代教育演变历程中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与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确定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对教育价值问题进行纯然哲学的分析与探讨的研究已经不少，结合近六十年来中国教育实践探讨教育价值的却不多。在实践上，社会与个人是与教育价值高频率相关的一个维度，也是中国教育六十年发展过程中尚未恰当处理好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探讨当代教育的价值问题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第一节 教育价值问题的界定

若以“社会与个人”这样一个过于开放的话题展开讨论，将会泛滥无归。这里首先限定为讨论教育问题。即使做这样的限定，仍然显得宽泛，因此有必要先对将要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明晰与界定，并在明晰与界定的过程中逐渐深入这一问题的讨论。

以社会与个人为论题，从教育角度加以研究可以进行教育功能、教育目的、教育价值三个层面的讨论。这三个层面的背后事实上都还存在一个对教育本质的判断问题。对于什么是教育的本质，至今看法不少。若从本论题出发，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工具，比如：“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化大革命”）、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是生产力、“教育是文化的繁殖，又是文化的创造”等等。第二种，认为教育是个体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活动，比如：“教育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学习活动”（林砺儒），“它是一种促进人类与自然、社会以及劳动诸方面之关系的工具。”（张栗原），或认为从人类生长、社会和文化三个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得出教育本质的三种不同的解释（林砺儒），^①或认为教育本质具有双重属性、多重属性。第三种，认为教育是促进个体发展的活动，如：个性化说、社会实践说、个体社会化说、能力传递说。^②从个体与社会角度探讨教育本质可以作为一种思考路径，但这样的探讨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达到真正明确教育本质的目的。然而对教育是什么的判断本身会直接影响到教育应该如何，这是必须清醒意识到的。

从功能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实际上遇到的是：教育以育人（促进个体发

① 郑金州：《教育本质》，引自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 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3 页。

② 郑金州：《教育本质》，引自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 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7～158 页。

展)还是以社会发展为基本功能。一种看法强调教育的功能是育人,另一种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从1950年以来,在较长的时间里,从政府角度反复强调的是教育的政治功能(其中一段时期还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工具职能)、经济职能(其中一段时期还曾狭隘地理解为生产斗争工具职能、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比较少地重视教育的育人功能,或将育人功能本身当成一种工具。^①教育本身具有多种功能,比如:文化传承、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国防、宗教、社会分层与复制等,若从不可替代性以及教育的要素、结构角度来考察,教育最基本最本质性的功能无疑是育人,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教育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

在主张教育的基本功能是育人的观念里,可以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教育的功能是促进人的社会化,还是促进人的个性化。前一种观点强调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强调职业化、规范化、角色化,暗喻着教育是一种求同的过程;后一种观点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因而要发挥自主性、独立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主张教育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尊重个性的求异过程。不论偏向哪一种倾向,都无法否认社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良好的教育不在于单纯追求个体的社会化,也不在于单纯追求个体的个性化,而应追求社会化基础上的个性化,失去社会化基础的个性化难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活下去,没有个性化的社会化个体就失去了他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

从教育目的层面讨论这一问题,焦点集中于以个体发展和个性特征还是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来确定或选择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是一定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的总要求,它同时又是个体实现其人生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教育目的的研究视野囿于政府统一的教育目的,忽视各社会团体厘定的或隐含的教育目的,更无视教育过程中当事人实际持有的教育目的(陈桂生)。^②个体本位教育目的论和社会本位教育目的论都有其片面性,又都有其立论的基础,只有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发展和諧地结合起来才能恰当地确立教育目的。

从教育价值层面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在教育中选择以社会为本位或选择以个人为本位。价值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关系,“教育价值也就应当是教育的有用性或‘效用’,是人们有意识地掌握、利用或接收、享有教育时,

^① 郑金州:《教育本质》,引自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 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② 黄向阳:《教育目的》,引自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 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页。

对教育有用性的看法和评价。”^① 与社会一般价值一样，教育价值存在着多样性，人们在认识和把握这种多样性时，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出发，个人—社会是其中的一个角度。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将教育价值划分为以个体为出发点，依据个体的内在需要来确定教育价值；或以社会为着眼点，依据社会的需要来确定其价值两个大的类型，通常称之为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

个人本位论通常强调应将个性发展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或将个体内在需要作为教育的依据，主张个体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或社会有助于个体发展才有价值。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等在他们各自所在的时代都倾向于个人本位论。通常个人本位论的基本观点包括^②：

(1) 个体的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中，个体处于中心的地位，而社会是个体之外的外部环境；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是目的，社会是为个体生存与发展服务的，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体的发展时才会有价值，评价教育的价值也应当以其对个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衡量。(2) 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它相信人本性的力量，相信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本能，强调把儿童带到乡村大自然的纯朴环境中，从社会的不良影响下挽救出来，在教育中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3) 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原则，其目标是培养“人”。要顺应儿童的天性，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进行教育，以激发儿童的天赋能力，使人的本性得到最完善的发展。

社会本位论则通常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来确定教育的目标，强调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主张群体或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个体只有满足了社会或群体的需要才有价值。中国数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本位教育价值观以及涂尔干、凯兴斯泰纳都倾向于社会本位论。通常社会本位论的基本观点包括^③：

(1) 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的存在与发展依赖并从属于社会，受到社会的制约，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靠社会提供营养，人的一切都从社会得来，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2) 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符合社会准则

① 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② 张天宝：《主体性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③ 张天宝：《主体性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个人只是教育的原料，不具有任何决定教育目的的价值。教育过程就是把社会价值观念或集体意识强加于个人，把儿童从不具有社会特征的人改造成具有社会所需要的个人品质的“社会新人”。

在现实社会中，除了典型的“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更多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行为常常处在两种极端价值之间，或带有某种偏向与基调，或在个人与社会这一维度内的特征并不明显。因此从个人与社会角度考察教育，无法脱离对教育本质的设定，也无法将教育功能、教育目的、教育价值三个层面分得一清二楚，对本质的设定通常决定了功能、目的、价值的选择。若要对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理论问题进行梳理，选择其中一个层面作为侧重可以方便和简化问题的讨论，这里试图主要从价值的层面展开对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的理论探讨。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教育价值与政策在教育实践中起到的绝对支配作用，在个人与社会这一维度上展开讨论的范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本身就具有多种功能，选择何种价值直接与每个受教育者的切身利益与需要密切相关，因此有关这一维度的思考与讨论又延绵不断，起伏跌宕。总体来看，这六十年是延续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以社会本位价值为主导的，一旦有个人本位取向的观念出现就有对个人本位价值的批判，主张个人价值的时候极少，这种极少的表现又在1980年之后。直到进入21世纪，人们才开始对个体的价值有了更多的尊重。

在上述总的轮廓之下，若要进行更加微观的分析，则需要依据各个具有明显特征的阶段来凸显出各种不同的主题或问题加以讨论，下面就以此方式展开讨论。

第二节 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

新政权建立必然导致新的教育价值的确立，以反映新的政权主体的教育价

值取向。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①，由于新政权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之上，“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便成为这种价值取向的显著特征。

一、“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提出

“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完全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依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提出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就提出了教育要为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教育建设方针中都强调，教育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教育目的时说“教育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服务，为当前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②。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的开幕词阐述得更明确^③：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因此除了我们的社会教育毫无疑问的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外，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打开门，一起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的骨干。

1949年至1956年的各种教育文件中都反复强调“教育向工农开门”、“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将工作重点转向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当时工农出身的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愿当工人、农民，只想升学，于是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① 《马叙伦在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 《钱俊瑞在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③ 《马叙伦在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此后，“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提法让位于对新教育方针的宣传，强调“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要“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但教育“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思想影响一直延续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

二、“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提出的背景

“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提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对于这一背景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条件不宽裕，受教育的机会少，文化程度低；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中，工农是革命运动的主体，共和国尚未成立之前，部分解放区就推行工农优先的教育政策，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政策形成的源头。“1947年夏秋，在东北土改高潮中，有些城市的中学，机械地搬用农村土改的做法，在学校中推行‘贫雇农路线’，在学生中组织‘贫雇农团’，错误地提出‘长贫雇农子弟的志气，灭地富子弟的威风’的口号，对地富子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学校甚至将地富出身的学生成批开除出校，送交家乡的贫雇农斗争。这样，使教育秩序大乱，地富子弟人人自危，有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被迫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蒋南翔抵制这种“左”的做法“却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和批评”^②，虽然当时这种“左”的做法受到党内一些人的抵制，但它的思想基础仍然存在，一旦有适合其发生作用的外部社会环境便会发挥影响，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政治角度分析，首先，工农联盟是新生政权的政治基础，从性质上决定了当时的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生政权的教育工作性质和任务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自《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② 刘文渊、蒋南翔：《清华人物志·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① 其中的“大众”即指的是当时人口占90%以上的工农。同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必然要求从文化科学和政治上不断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素质，以加强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教育成为加强这一基础的有效手段，工农群众通过教育也增强了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此外，新生政权中确实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东北解放以后，虽然蒋南翔和哈尔滨市教育局领导一道研究，明确规定了两条政治界限：“（1）不能把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同地富本人画等号，应该争取他们站到革命这边来，不应推到敌人方面去；（2）学校是教育单位，不能机械地搬用农村的贫雇农路线，绝对不准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体罚和斗争。”^② 但当全国解放以后，这两条政治界限并未坚持太长时间，反而演进为“成分论”、“血统论”在社会上、政府行为中极为流行。

从经济角度分析，新成立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亟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工农既是各行各业建设的主力军，又是生力军。对他们进行教育是迅速恢复生产，振兴经济的有效措施。无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社会主人翁意识，还是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技能培训，都是当时效果极为明显的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文化角度分析，工农是当时也是大多数情况下文化水平最低的社会阶层。他们渴望文化教育，渴望在政治上翻身之后也能在文化上翻身，受到一定教育是他们迫切的心愿，向他们打开学校之门是兑现他们夙愿的一种方式；而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看，文化的下移也是当时化解社会尖锐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当时所提出的“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在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到位的执行。教育部在拟定1950年上半年工作计划草案前，还专门召开了工农速成中学、工人业余补习教育的座谈会，1950年9月，又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工作会议。当时确定的教育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且在当

^① 有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② 刘文渊、蒋南翔：《清华人物志·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确定将“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工作目标。

这种方针政策见诸实践表现为：

一是各地充分利用工农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发挥他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迅速办起了大量工农速成中学、工农业余补习学校。在城市建立职工工业余学校，农村由推广冬学逐步转向推广常年农民业余学校，各级政府还创办了大批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扫盲和识字运动，掀起了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热潮。1950年6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工业余教育的指示》，1951年1月成立了全国职工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各省市接着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二是创办新型大学。其目标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注重发展科学与技术教育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高校采取了一些倾斜政策，尽量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其中包括以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为基础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和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为基础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及各省市、各部门办的一批学校。

三是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首先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尊重劳动和热爱劳动的教育，肃清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的错误观点，激发工农群众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其次是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学生中的工农成分，在城市中由政府投资建立大量公立中小学和幼儿园以满足工人子弟的入学需求，在农村采取“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的形式办学以方便农民子女就近入学，以减免学杂费、赠送教科书和学习用品来吸收失学的工农子弟，在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中优先录取工农及其子女，并降低文化考试标准或采取选送、保送、免试入学等办法给予照顾。1952年全国中小学工农成分的学生占总数的80%，1953年全国普通中学中工农及其他劳动者子女人数占学生总数的71%，高校新生人数中27.39%为工农成分。

四是在学制、教学内容与方法上加以改革。学制上增加了工农业余及速成教育、技术学校的设置，将工农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内容上切合工农的需要；方法上采用工农群众能够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

上述影响可以归纳为，在较短的时间里教育得到较大范围的普及，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都随之发生了一些革新，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偏重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热情多于理性，对教育规律缺乏尊重，以至在后来的“大跃进”背景下演变为教育大跃进，大搞突击竞赛，

大搞献礼活动，大搞全党全民办校，大搞扫盲运动，大办业余教育，大力培养“红透专深”的人才；“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演变为教育大革命，1970年更是以“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为由完全废除考试制度，全国高校开始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截至1976年，全国共招收七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人数94万，其中绝大多数因文化基础差而无法开展教学。

四、对“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的分析

从教育价值角度分析，“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无疑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这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本位论，而是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其政治色彩浓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色彩；在观念上指向的是特定群体、阶级或阶层，在教育实践行为上指向有工、农身份的社会个体，体现为工农个体本位论，所以准确地说它是有特定价值内涵的社会本位论的教育价值观的体现。

“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提出，不可否认它的合理性。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工农及其子女长期排斥在校门之外不仅是一种极不公平合理的现象，而且是一种落后的现象，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与落后，唯一的选择是确定教育“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从个人与社会角度可以作如下分析：

首先，这一方针从维护绝大多数个体的受教育权益出发，将教育由社会中极少数人享有变为绝大多数人享有，无疑有利于社会公平与进步。作为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作为一次教育革新，它满足了为数众多的个体的受教育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本位，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本位，代表着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个体，代表着那些真正渴求教育的个体，为他们赢得了类似于穷人的窝窝头的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它对个体与社会都有极高的价值。

其次，这一方针执行应该有其特定的边界和条件。就其边界来说，它的执行不应妨碍非工农成分的社会成员正常地接受教育；就其条件而言，各级各类学校接受工农入学必须是学习对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与非工农社会成员相比，其受教育的优先是有一定限度而非无限的。由于这一方针提出的特殊历史背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与其他相关政策的相互或共同作用，使得它的边界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它的条件更是被人们无视或有意地放宽了，导致教育领域长时间进

行着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工作，这种低效对包括工农在内的所有受教育者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极大。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偏差，使得这一政策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再次，这一政策本身是对历史的校正。对于校正中出现的問題，1977年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①。无疑这段话的侧重点是“提高”，是重点学校及其在其中学习的学生。它对于解决当时的问题是有效的，但却为此后教育向新的越来越不公平的方向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如何正视并解决现实教育中的严重不公平，应当以史为鉴，不走极端，寻找到一种对社会各阶层、对各种不同的个体都极可能有利的解决办法。

必须看到，这一政策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的不缜密性，但在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大于政策本身的问题。这就警醒人们在保证政策正确的同时还要避免“歪嘴和尚念经”的现象出现，这一点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来说有更普遍的意义。

第三节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新建立的政权在从建立到巩固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矛盾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它在解决矛盾时所使用的方法便是不断强化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地位，“向工农开门，为工农服务”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于是教育价值逐渐转向并最终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出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出有一个“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根子早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便存在，并在新政权建立之后转变为政府的教育行为，整顿和加强学校管理，发挥共产党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进行“革命的政治及思想教育”^①，并落实到管理、课程、学制和教学的各个环节。例如当时给小学生出的作文题目常常是“论当前妇女运动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教师将班会开成思想斗争会、质问审判会，教师从学生中培养一批“小干部”来“管理”学生。^②1950年钱俊瑞就对教育中“我不为谁服务，我不参加政治，我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进行了批判。^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④

1950年7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跟着新生的力量走》客观上体现了这样的价值取向，该讲话首先确定了“我想青年人一定是选择新生的方向”的前提，然后说“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无产阶级是新生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是没落的”。接着依据在场的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的情况，提出要“确立工人阶级立场”，“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⑤。

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更加明晰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价值取向。

1952年将思想改造列为学校三大中心任务之一，旨在“批判资产阶级腐朽

① 《高等学校暂行规程》，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第43次会议批准，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颁布。

② 《冯文彬在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③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引自《人民教育》，1950年第1～2期。

④ 《为争取国家经济好转而斗争》，引自《人民日报》，1950年6月13日。

⑤ 《跟着新生的力量走》，引自《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思想，逐步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各级学校教育中的领导”^①。同年10月在高校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辅导处、政治辅导员，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

1954年年初，党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文化教育工作，已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文化教育工作要和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更加密切配合起来，更好地为它服务，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②

1955年，陆定一提出“办好教育工作的根本问题就是办好党，就是在学校里建党”，并将“办党”分为“党和青年团要发展组织”、“配备党员校长、副校长”^③两个方面。同时教育部发文要求“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确保工人阶级思想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作用……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人，使我们的中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④

由于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之前，官方一直使用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政治”这一概念使用，而在八大上，明确提出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⑤。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文中说：“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完成了这个转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⑥这三段话无论是分开来理解，还是结合在一起分析，均包含着教育为

① 《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② 《钱俊瑞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③ 《陆定一在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3月24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4页。

④ 《教育关于中学教育工作汇报会的通报（1955年4月9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

⑤ 《中共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引自《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8期。

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自《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